

梁奇达——常怀四海心 风范昭后人

梁奇达（1916—2002），曾用名梁浪舟，广东省开平市人。1936年入党，抗战时期任中共中山县五区区工委书记、中共中山县委书记、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粤中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梁奇达的青年时代，适逢祖国遭受国破山河碎，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的艰难之旅。1936年10月，由王均予介绍，梁奇达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立了高要地区重建党组织后的第一个党支部，梁奇达任支部书记。1937年春，他在广州石岭小学以教师职业作掩护，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时与中山大学的同乡梁嘉在一个党支部，梁嘉为支部书记。他与梁嘉等发动了数十名中大学生到广州市郊开展夜校教育。同年夏，由于身份暴露，梁奇达被当局通缉，组织安排他易名梁浪舟，转移到中山工作。

抗战爆发前夕，梁奇达来到中山大布乡。当时的大布小学校长孙一之是共产党员，他聘任梁奇达为该校的教务主任兼教师以掩护工作。这时，中共中山党组织已在五区发展了一批党员，梁奇达到后，即成立五区工委，他任区工委书记，与区委委员叶向荣、孙一之团结合作，努力发展组织，积极推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五区区委工作的重心放在发动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抗日方面，组织了谷镇文化界抗日工作团到附近一带乡村宣传救亡，演街头剧，出版乡报、壁报等，还组织了壮丁队、救护队、妇女大刀队等群众组织。梁奇达很注重在爱国青年中物色发展对象，建立党组织，很快就在五区的十多个村发展党员近200名，成为中山发展党员数量最多的地区，并建立了多个村党支部。当时的五区被称为中山的“小延安”，这与梁奇达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梁奇达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1938年5月，经中共广州外县工作委员会批准重建中共中山县委。同年8月，梁奇达任县委组织部长。在任期间，他尽职尽责，着力抓好党的组织建设，为发展、巩固与壮大党的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至1939年10月，中山有中共党员500多名，为全省之冠。在全县九个区中除七区因沦陷较早未建立党组织外，其余的八个区都建立起党组织，当时的县委机关设在石岐民生路，常驻机关的县委副书记孙晖如与县委委员、组织部长梁奇达，宣传部长徐云同租一幢房子住，生活异常艰苦。

梁奇达十分重视培养干部。1938年冬至1939年初，县委利用放寒假期间，先后在石岐莲塘街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张鹏光是中共党员）、崖口村、贝头里村举办了3期党员骨干学习班，梁奇达从筹备开班到讲课都亲力亲为，党员骨干经过培训，回去后都成为珠江敌后抗战斗争中的中坚力量。广州沦陷后，战火波及中山。

中山县委带领全体党员坚定地站在斗争的前线，加紧发动民众，积极做好抗击日军进犯的准备。1938年12月9日，成立了由国共两方人员组成的广东省抗日青年先锋队中山县队，县总队长由国民党中山县县长张惠长担任，副总队长由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担任，梁奇达负责具体的领导工作。接着，又成立了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会长由张惠长的妻子薛锦迥担任，副会长由共产党员刘紫云担任，各区亦相应成立了抗先区分队和区战时妇女协会分会。1939年10月7日，日军首次攻入石岐，时任县委书记的梁奇达亲自率领一区张溪、员峰近百民兵开赴五桂山马溪村，与五区区委书记郑少康率领的民兵汇合，准备迎击敌人。1939年秋，中山的中共组织及革命团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反共逆流的冲击，县委书记孙康被通缉，“抗先”、“妇协”等抗日群众团体被勒令停止活动或解散。县委机关转设在贝头里村，时任县委书记的梁奇达就住在这个村的群众家里。他坚定地领导全县党员坚持斗争，尽管自己身处险境，仍组织安排了一批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成功转移，安插了一批地下党员在五桂山区各村庄当教师，有效地保存了中山革命有生力量。

1939年10月，省委将中山县委的隶属关系划归粤中特委。县委班子领导成员孙康、孙晖如、叶向荣、徐云、梁绮卿等相继调走，只剩下梁奇达一人。粤中区特委调陈翔南任中山县委书记，梁奇达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积极配合陈翔南努力做好工作。中山全境沦陷后，尽管困难重重，他仍以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做好隐蔽党员和发展抗日武装的工作，在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政策路线教育的基础上，搞好组织整顿的建设。根据粤中特委指示，中山县委要在沦陷区“埋头苦干，长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梁奇达在贝头里召开敌后工作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的精神和特委的指示，为迎击日军，惩治汉奸，稳定民心，梁奇达指示大布支部、上栅支部立即调动民兵袭击雍陌、大金顶的敌军，郑少康、郑吉等带领大布民兵分两路袭击驻守雍陌的日军，打响了中山沦陷后抗日的第一枪。

1940年3月，日军大规模入侵石岐，国民党中山守军弃城逃至新会沙坪镇，时任中山县委书记梁奇达率中山县委组织石岐周围二十多个乡近千民兵在山头伺机行动，打击日军。中山沦陷后，梁奇达贯彻中央、省委建立敌后抗日武装指示，通宵达旦主持会议，分析在中山组建武装的有利条件，在中山建立起了七个中队、两个大队的抗日武装。

1941年8月，中心县委派谢立全到中山，对建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性进行调查。1942年1月，谢立全、梁奇达到中山九区牛角沙召开抗日游击武装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心县委关于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会议决定把在中山九区活动的中山人民抗日游击武装逐步转移到五桂山区活动。梁奇达奉命以

广游二支队政治特派员的身份，到中山协助谢立全做部队的政治工作。事实证明，谢立全、梁奇达的调研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中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依靠中共中山地方组织和当地群众的支持，解决了部队的给养，以五桂山为依托，不断向周围平原地区出击，杀敌除奸，扩大游击区，使五桂山成为珠江敌后抗日游击中心。1945年1月15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在五桂山区公开宣布成立，梁奇达任第一支队政委。

梁奇达善于做党员、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教育。如给交通员训练班上课，他侧重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教育。跟部队战士上政治课，侧重于形势任务、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抗战、团结、爱国”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教育。他关心爱护战士，数百名游击战士曾在他在五区大布村设立的伤病员总站及各分站疗过伤治过病。战争年代，条件十分艰苦，给养缺乏，不少指战员都患上夜盲症和疟疾，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指挥部把为战士们治疗夜盲症的任务交给梁奇达负责。由于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视山区的群众如父老乡亲，而山区的大爷大娘也待他如自己的儿子，因此，梁奇达一下子就在五区大布、平湖、乌石、平岚、鸦岗、雍陌、沙岗、白石等村动员了一批群众，腾出房子接收病员，找来民间医生为他们诊疗，部队也想方设法改善给养以提高夜盲症的治愈率，使部队的战斗力明显增强。

1945年5月9日，日军向五桂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扫荡”。梁奇达与周伯明、欧初、罗章有、杨子江带领一支队，在根据地群众的支持下，勇敢地坚持战斗，采用小部队打麻雀战杀伤敌人。为保存实力，避敌锋芒，部队决定转移东江作短时间休整。1945年5月下旬，周伯明、欧初、梁奇达带珠江纵队第一支队的民族队、交通站、爆破排以及珠江纵队司令部全体机关工作人员200多人的先头部队，从五桂山出发，分7艘帆船向东江进发。先头部队到达东江后，周伯明、梁奇达指挥攻打沙井战斗告捷，声威大震。随后，根据省委指示，一支队分批战略转移东江。

日本投降不久，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配合东江纵队收复铁路以西全境，进驻宝安南头执行对日军受降任务。其间，梁奇达负责处理将日本驻澳门的特务头子黄公杰引渡回澳门受审，他安排欧初夜审黄公杰后，叫阮洪川将黄公杰引渡回澳门交给澳门政府处理。

1945年10月下旬，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划归东江纵队，梁奇达任江北地委委员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率部挺进博罗、龙门一带，随后，受命北撤山东，为解放全中国而继续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梁奇达调回广东工作，先后任珠江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珠江公学校长，粤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广东高教局党组书记、副

局长，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书记、副校长。尽管公务繁忙，但他依然深深地眷恋着五桂山，怀念根据地的父老乡亲，关心中山革命老区的建设。

1983年，梁奇达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担任广东省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他到中山寻找过去在五桂山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了解中山老区的建设情况，又到革命老区五桂山、南朗镇、南头镇等调查研究后，亲自撰写了《中山老区建设的情况与问题》等调查报告，为中山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教育和文化等建设提建议出点子。

梁奇达不遗余力地支持党史工作。他亲自撰写党史材料、回忆文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1987年，中山市委、市政府决定重建中山革命史迹陈列馆，他把这视作革命传统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从组织落实、展览大纲的整理、审定，到征集革命文物，到展览形式、展出时间都一一过问，多次到中山烈士陵园与工作人员研究具体事宜。在他所提供的资料中，甚少提及自己，他认为那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2002年9月28日，梁奇达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他的精神风范、高尚品德、优良作风、公仆形象和群众观念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